

20

日本 与亚太

世纪之交的分析与展望

● 孙承 主编
● 世界知识出版社

日本与亚太

——世纪之交的分析与展望

孙 承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丁 品
版式设计：车胜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与亚太：世纪之交的分析与展望/孙承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8

ISBN 7-5012-0886-7

I. 日… II. 孙… III. 日本-研究 IV. D7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468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7.75 字数：195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次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日本国内政治基础的演变	7
一、70年代以前的日本——“保革伯仲”的时代	7
二、70、80年代的日本——新保守思潮的抬头	18
三、进入90年代以后的日本——大国主义思潮的盛行	29
第三章 处在重大转折期的日本经济	40
一、泡沫景气崩溃后的日本经济	40
二、“世纪末大萧条”的特点、性质及其成因	51
三、进入战略大转折的日本经济	62
第四章 走向21世纪的日美关系	71
一、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面临严峻挑战	71
二、《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反映出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基本趋势	76
三、对“冲绳事件”冲击的反思加速美国调整对日安全战略的步伐	83
四、美国实现对日安全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	88
五、走向21世纪日美关系的基本趋势	92
第五章 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	101
一、奠定政治大国的物质基础	101
二、大国意识——政治大国的思想基础	106

三、积极推行“大国外交”	110
四、建立日美“新型伙伴关系”	113
五、在新形势下重新给中日关系定位	116
六、大力改善同东亚国家的关系	119
七、发展中日关系，促进东亚的和平与繁荣	126
第六章 走向 21 世纪的日本对外战略	138
一、日本对外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困惑	138
二、日本调整对外战略时的选择	154
第七章 世纪之交日本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181
一、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的发展	181
二、日本在亚太地区面临的经济挑战和对应	189
三、世纪之交日本在亚太经济中的作用	199
第八章 世纪之交日本在亚太政治与安全中的作用	218
一、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作用	218
二、日本的新防卫政策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227
后 记	239

第一章 引 言

日本是西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自古就同东亚大陆国家有密切的往来，但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周围环海的地理条件限制下，日本同外界的交往仍然是有限的。在近代以前的 200 多年里，日本在“锁国”状态下，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封建文化臻于顶峰，是免受外界侵扰的“世外桃源”。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环球市场的形成和日本资本主义改革的成功，深刻地改变了日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从此日本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密不可分。亚太地区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进程，日本在前进道路上的成功与挫折，也给亚太地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近代以来，周围世界给日本以深刻影响的变化有两次。第一次在 19 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在西方确立统治之后，开始向外扩张，打破了各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使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一过程中，东方古老国家的大门先后被西方以其商品和武力敲开，这些国家持续千百年的宁静从此被动荡和屈辱所代替。“西力东渐”的结果使东方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形势发生亘古未有的巨变。在这一变化中，日本作为西方建立环球市场的最后一个链节，也未能幸免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然而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的是，这一冲击却提前触发了一场成功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社会变革，它最终使日本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

资本主义社会的跃迁，恢复和保持了日本的民族独立，并使资本主义获得较快的发展。

第二次给日本以深刻影响的世界变化是在 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分裂成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日本作为战争的失败者，在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事占领。在美国的控制下，日本制定了放弃重新武装的和平宪法，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了西方化的民主改革。随着“冷战”的开始和远东形势的变化，美国调整对日政策，一方面实现对日媾和；另一方面通过缔结美日军事同盟，把日本变成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前哨。而日本则在军事上托庇于美国，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成为美国的从属国。这种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从属地位却使日本得以专注于经济发展，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到 70 年代，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世界形势的变化造成了日本的两次历史性转折，而这两次转折也给世界特别是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转折是在 19 世纪末，日本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就开始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和掠夺，同西方列强争夺远东的资源和市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从西伯利亚到印度尼西亚，从夏威夷到孟加拉湾的广大地区都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奴役之苦。日本企图依靠武力把亚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把自己放到了与亚洲人民为敌的位置上。日本的侵略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但也随即以惨败而告结束。日本的侵略给亚太地区留下了至今难以愈合的创伤。

第二次转折是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之后。日本从 50 年代后期逐步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与东亚的经济联系，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持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缩小因经济发展而引起的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矛盾，提高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对东亚地区经

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牵引作用。东亚与日本卓有成效的经济合作，使东亚经济以超过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迅猛之势向前发展，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首的“雁行发展序列”，世界经济地图的面貌也因之大为改观。

纵观近代以来日本同亚太国家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亚太地区所起的作用因其内外政策和周围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截然不同。

在近代，亚太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除了日本之外都处在西方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之下，贫弱交并。东亚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舞台。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入了瓜分世界的角逐。在同西方的抗争中，日本把“富国强兵”作为最高的民族理想，并为此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这一方面表明日本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争取成为西方那样的先进工业国；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统治集团对处于西方剥削压迫下经济政治落后的亚洲国家的错误认识。这种思想的极端发展，导致日本同西方争夺对亚洲的控制，企图把亚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以亚洲盟主的地位同西方相抗衡。近代日本一度泛起的“大亚洲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这一思想的变种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并极振兴民族经济，促进社会发展，过去贫穷落后的东亚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也在摆脱贫军国主义统治之后，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现代经济是一种国际经济。日本在经济发展后要求确保资源供给和扩大市场，必然要加强同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亚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经济上的相互合作，不仅有利于日本的发展，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作用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受到了这一地区国家的欢迎。战后日本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是时代的产物，是日本顺应时代发展，为亚太地区作出的积极贡献。

历史表明，日本民族深悉世界脉搏的变化，能够对周围世界的变化作出敏锐的反应。一般说来，在外部压力增大时，日本往往采取内向的政策，改革国内体制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促使自身发展；而在经济发展实力增强之后，则采取外向的政策，以某种方式“承担地区性义务乃至全球性义务”。日本内外政策和周围世界关系的这一特点，在当前这一世界格局的重大转换时期，日益为世界所重视。

从 70 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两极格局逐渐动摇。美苏两个超极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长期军事对峙，耗费了巨大的国力，都已显得精疲力竭，财政支绌，国内矛盾重重，面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已难有招架之力，都开始另谋出路，以求解脱。苏联自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以后，提出所谓“新思维”，对外企图缓和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争夺，对内寄希望于改革以走出困境。然而事与愿违，苏联这一庞大帝国内所隐藏的各种矛盾因此而一齐迸发，导致长期动荡，难以收拾。美国一面对苏联的缓和攻势虚与委蛇，一面要求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获得经济发展的盟国分担安全责任，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战略伙伴，被要求扩大其在西太平洋的防御范围。日本国内要求修改“专守防卫”的方针，扩大在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中的责任的动向也逐渐增强。

90 年代初，继东欧发生剧变后，苏联也最终解体，两极体制崩溃，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以美苏对抗为标志的“冷战”时代随之结束。随着旧的两极体制的崩溃，与旧体制俱来的矛盾在缓和，而为旧体制所掩盖的或暂居次要地位的矛盾却暴露出来或走向激化，从而使世界上的各种力量进行重新调整，寻求新的定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入了大调整，大变动的时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动。

世界格局的演变再次使日本面临新的选择。在国际上，俄罗斯的动荡使日本长期面临的“北方威胁”减弱；美国在亚太地区

的军事收缩倾向以及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使日本战后一直依靠美国的安全政策受到考验。日本是否还要坚持原来的安全政策？在亚太地区力量调整和重新配置中，日本在发挥积极的经济作用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在政治、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两大趋势中，日本将采取怎样的对策？是否应参与筹组东亚经济集团？日本周围安全形势缓和后，日美经济矛盾尖锐，日本是否应坚持日美同盟体制？日本将如何处理与美国和与亚洲的关系？日本的对外战略中，亚太地区处于怎样的地位，日本将采取怎样的亚太战略以适应国际格局的转换？在国内，日本政治、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长期由自民党一党主宰日本政治的局面已经结束，日本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将如何发展？是实行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还是继续实行多党政治？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使日本的社会思潮也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变的趋势如何？它对今后日本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如何？日本经济在经受“泡沫经济”和日元升值打击后将如何发展？日本经济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着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日本金融、外贸和国内经济结构方面将进行怎样的改革？在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应采取怎样的防卫政策？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在困扰着日本，日本国内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90年代初以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给日本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海湾战争中，日本因只出钱不出人而受到西方国家的责难；日美经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难以解决；“泡沫经济”破灭和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政界和金融界丑闻迭出，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这一切使政治、经济改革成为日益迫切的任务，日本内外政策调整已是必然的趋势。

那么，日本的内外政策将如何调整？这种调整将对世界和亚太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已成为世界特别是亚太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当前这一世界格局的转换过程中，亚太格局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与欧洲的动荡和停滞不同，基本上保

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亚太地区的变化是在稳定中发生渐变，在繁荣中进行调整。当前亚太地区良好的经济和安全形势是战后以来所未有的。亚太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人们甚至乐观地估计，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但是，在稳定与繁荣中并非不存在隐忧，化解影响本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促进持久的稳定与繁荣，是亚太国家的共同愿望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各国普遍关心的是中、美、日、俄、东盟等主要力量在本地区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的调整。这些国家和地区集团发挥积极的作用和保持相互关系的均衡发展，有助于保证这一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日本是本地区的经济大国，突出的经济作用及其经济蕴含的巨大潜力，使之能够对本地区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这也是在世纪交替之际，世界格局转换之时，日本内外政策走向和日本在亚太地区地位、作用受到普遍关心的根本原因。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复交20多年来，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培育下，友好关系得到发展。两国卓有成效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已经对双方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在当前这个国际格局正发生历史性转换的时期，中日两国人民更应该高瞻远瞩，加强相互了解，增进相互信赖，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章 日本国内政治基础的演变

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与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分析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是预测日本将来在世界舞台上，尤其在亚太地区地位、作用的关键因素。而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又是与其历史，特别是与其战后历史一脉相承的。所以，分析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明了日本今后在国内与国际的走向。简而言之，70年代以前，日本把经济发展作为至上目标，国内社会舆论亦以和平民主思潮为主流，55年政治体制就是其反映，在外交上也采取了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7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国内新国家主义思潮抬头，中曾根保守政权出现，对美关系追求平等；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大国主义思潮盛行，日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积极插手世界热点地区，并试图以亚太地区为地盘，构筑与欧美抗衡的势力范围。本章将战后日本政治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探讨日本国内政治基础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一、70年代以前的日本——“保革伯仲”的时代

（一）民主化改革与和平民主思潮

战后初期，经济发展优先路线得到实施，和平民主思潮盛行，其基础是战后民主化改革以及日本人民对战争的反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军队进驻日本，盟国司令部按照美国的非军事化及民主化对日本方针，在日本推行了一整套的改革措施。在军事方面，命令日本军队缴械，并加以解散；废除元帅府、参谋本部、军令部、陆军省、海军省等军事领导机构；废除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国民总动员法以及战时紧急法等军事法令；禁止军事生产和军事科学的研究等，从而摧毁了日本的旧军事机器。

在政治方面，废除政府对新闻业的统制，贯彻言论与新闻自由；逮捕和审判战争罪犯，揭露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对外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废除限制思想、宗教信仰、集会、言论等自由的法令和规定，释放根据这些法令而被拘留、监禁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其自由的人员；废除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从教材中删去有关内容，允许教职员和学生对教育内容进行批判性的评论以及自由讨论有关政治、宗教、公民自由等问题；解散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并开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其中包括职业军人、军国主义团体成员、政治家、殖民地官员等；颁布工会法，开放工人运动；降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并赋予妇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

在经济方面，进行农地改革，低价收购地主的土地转售给佃农，消灭地主阶层，培养自耕农阶层；解散财阀集团以及避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以上政治和经济的政策性改革为制度性改革奠定了基础，这里所说的制度性改革是指通过新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将战前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改变为战后“民主政治体制”。

宪法是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形成的基础。该法是美国占领军提议，经日本国会通过实施的。早在1945年10月，美国占领当局两次指示日本政府修改宪法，并起草一份有关改宪根本原则的备忘录交给当时的币原内阁。币原内阁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改宪纲领，于1946年3月6日公布。国内舆论对该纲领普遍持赞成态度，因此，新宪法很快通过国会两院及天皇咨询机关枢密院的审议，从

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随后，国会为补充说明宪法条款，在1947年连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家政治体制的法律，如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国会法、内阁法、地方自治法，皇室典范法、国家公务员法和警察法等等。

新宪法及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彻底改变了战前的政治体制，不仅推动了和平民主思潮的发展，而且也保障了政治民主化的形成。首先，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意志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授予皇室财产，皇室承受或赐予财产，须根据国会的决议”。这些规定改变了战前天皇现人神以及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的地位，同时也铲除了皇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教育的基础。

其次，从战争反省的立场出发，新宪法规定，“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同时还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必须是文职人员，从而从根本上铲除了战前凌驾于国会与政府之上的法西斯军事体制。

第三，新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改变了战前行政机构拥有广泛立法权、国会从属于天皇或天皇之下的行政机构的状况。“众议院、参议院均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全体国民的议员组成”的规定，不仅取消了敕任议员组成的贵族院，也取消了天皇的私人咨询机关——权力很大的枢密院。“内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共同负责”，“内阁总理大臣经国会决议在国会议员中提名”，“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不论其是否在两院之一保有议席，为就议案发言均得随时出席议院，另外在被要求出席答辩或做说明时，必须出席”等规定，进一步将行政机构拥有的行政权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新宪法明文规定，

“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行政机构不得施行作为终审的判决”，“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保障了司法的独立性，以求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平衡。

第四，战前日本采用中央集权制的方式管理国家，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等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员均由中央政府任命。这一政治体制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对国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政治体制逐渐阻碍了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因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干预民众的政治行为，特别是政府常常干预选举过程，以保障那些特定候选人当选，或通过选举活动严格控制选举人的活动，从而降低了国民对选举的关心，限制了其政治主体意识及参与意识的提高。战后宪法及地方自治法明文规定，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及议会议员均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并接受当地居民的监督。作为地方公共团体，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可以实行广泛的自治，不仅能够按照地方自治的宗旨制定法律、规定其组织及其运营事项，而且拥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以及执行行政的权力。

由此可见，战后初期和平民主思潮在日本的发展与美国占领当局实施的改革政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思潮也来自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反省以及进步势力的活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接受的是皇国主义教育，绝大多数国民具有大和民族优越的意识，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基础上支持军国主义者对外穷兵黩武的政策。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不但没有实现其目的，而且使广大国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甚至处于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战争的失败给日本带来了生产停滞、工人失业、物资奇缺以及物价高涨、普通国民生活艰难的局面。战争教育了日本人民，因而他们强烈要求和平与民主，要求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希望实现能够代表国民的国家政权和政治体制。在上述背景下，通过日本进步势力的积极活动，工人和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开展争

取民主、和平和基本权力的政治斗争。

（二）大众运动与多党化时代

工会组织首先出现在煤炭行业，到1945年末，全日本已有96个煤矿工会，会员达16万人。受其影响，各行业工会组织纷纷成立，到1946年末，全国已有1.7万多个工会组织，拥有493万名会员，组织率高达41.5%；在农村，日本农民组合从1945年10月开始筹建，到1947年6月已拥有4000个支部，130万名会员，有力地推动了农地改革。工会组织与农民组织还采取直接行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众议院议员选举）前夕，日本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由工人、农民和市民团体举行的打倒币原内阁大会。特别是在东京，几乎每天都有数万名工人、市民和近郊农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以至于币原内阁在大选后不得不辞职。

1946年5月1日，东京有50万群众在皇室广场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建立民主政府和稳定生活。5月19日又在广场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突破粮食危机国民大会”，强烈要求政府解决粮食危机，使吉田茂保守内阁迟迟不能出台，最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保护下才粉墨登场。

在开展斗争的基础上，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946年8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成“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简称“产别”），拥有163万名会员；社会党影响下的工会组成“日本工会总同盟”（简称“同盟”），约有100万名会员。^①同年，这两大组织领导了被称为“十月攻势”的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反对解雇。“十月攻势”的结果仅使民间产业工人的生活得到局部改善，因而在1946年11月，又有156万名政府部门公务员组成“全官厅共同斗争委员会”，发表联合斗争宣言，提出最低工资制等要求。1947年，三大工会组织成立“全国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要求提高工资，并宣布从1947年2月1日起举行无限期总罢工。为此，

在1月28日举行了有46万人参加的“打倒吉田内阁突破危机国民大会”。虽然“二一总罢工”在占领当局的直接干涉下，没有能够举行，但吉田内阁却因此倒台。

“二一总罢工”的流产使大众运动从以直接行动为重点转向以间接行动为重点，也就是利用自己的政治代表参与立法活动，实现和平民主、经济繁荣的愿望，从而推动了多党化时代的出现。实际上，早在1945年10月占领当局颁布“废除对政治、民主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指令以后，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各派政治力量不断进行分化组合。1945年底，日本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大会，重建共产党，声明其纲领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同年11月，日本社会党召开建党大会，以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作为该党纲领。声称“维护君民一体的国家、确立负责的立宪政治”的日本自由党，捍卫国体、攻击共产主义的日本进步党以及标榜合作主义、主张劳资合作的日本协同党也在1945年底成立。

1946年4月10日，战后首次大选举行。参加选举的政党有258个，候选人达2770人。选举结果：自由党获140席，执政的进步党获94席，社会党获92席，协同党获14席，共产党获5席，其他诸小派获38席，无党派获82席，妇女议员有19名，新当选者占议员总数的82%。从选举的结果来看，革新势力政党社会党成为国会中第三大党，共产党议员也首次进入国会，这无疑是民主势力的一次重大发展。

选举结束后，币原内阁恋栈不去，自由党、社会党、协同党、共产党组成倒阁委员会，同国会外反对币原内阁的群众运动相结合，迫使币原内阁总辞职。取而代之的第一届吉田内阁采取同工人运动相对抗的方针，结果在上台不到一年后的1947年4月被迫举行大选。大选前夕，各种政治势力再次发生分化组合。以进步党为基础成立的日本民主党，在政治上主张修正资本主义，“尊重劳工的重要性，实现经营者和劳工的合作”；此外还出现了代表富